

孙微●著

QingDai DuShiXue WenXianKa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清代杜诗学文献考

孙微·著

QingDai DuShiXue WenXianKa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清代杜诗学文献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杜诗学文献考 / 孙微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729-143-5

I. 清… II. 孙… III. 杜诗—文学研究—文献—中国—  
清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327 号

书 名 清代杜诗学文献考

著 者 孙 微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143-5

定 价 22.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张忠纲

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史上集大成的时代,这时期杜诗学文献涌现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以迄清末,见于著录和现存的杜诗学文献著作约 800 种,其中清代杜诗学文献就有 410 种以上,占总数的一半多。除了数量众多之外,清代杜诗学文献的质量也是历代杜诗评注本中成就最高的,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黄生《杜诗说》、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都是杜诗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杜诗注本。虽然清代的杜诗学取得的成就颇大,然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研究状况却并未尽如人意。目前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总体了解主要是依据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 1986 版)和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版)二书。然而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二书各自相对独立成书,未能互相借鉴,所收清代杜诗学文献在数目上有较大出入,并且二书重收、误收的较多,需要进行认真修订。除了以上二书所甄录的文献之外,尚有为数不少的清代杜诗学文献未被发现和收录,这些文献散见于诸多零星的文献记载之中,亦亟需进行整理。因此,对清代杜诗学文献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细致的梳理,力争早日编纂出一部能够全面反映清代杜诗学文献整体状况的书目,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迫切

需要。

孙微博士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考》一书是目前为止对清代杜诗学文献搜罗最为全面丰富的著作。全书共收清代杜诗学文献410余种,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前人。著者通过更为细致深入的钩稽考索,补充了很多前人遗漏失载的文献,并且订正了前人的许多疏失,重新厘定出一个相对完备、翔实的清代杜诗学文献的书目,其嘉惠学林之功可谓大矣。我注意到有许多杜诗学文献都是本书第一次著录,如陆钺《杜诗注证谬》、沈起《测杜少陵诗》、刘佑《杜诗录最》、程琦《集杜各体诗》、许之渐《次杜草》、徐禄宜《杜诗偶识》、陈浩《杜诗读本》、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等,可以说正是由于本书著者的不懈努力,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调查,目前已经基本上做到了摸清家底,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清代杜诗学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

本书在侧重著录文献的同时,还尽量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版本、收藏、著录以及今人的研究情况等予以介绍,这就为研究者进一步考索提供了很大便利。因为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使读者基本明了哪些文献尚存,都保存在哪些单位,存在什么不同的版本和抄本;哪些文献已经散佚,因何原因大致散佚于什么时间;哪些文献虽然已经散佚,但是通过辑佚工作能够予以最大限度地恢复原貌等情况。另外,本书对散佚杜诗学文献尽量搜检辑录其书序跋,著录杜诗学文献名称时尽量对文献的异称进行介绍,并标明所据,这些工作也都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对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考证也是本书用力较多的地方。著者通过广泛的考证,充分利用方志、年谱、书目、碑传、选集、别集及出土文物等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对诸多失考的杜诗学文献著者的生平情况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钩稽,很多历来以为无从稽考的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也有了明确答案。本书就文献著者的名号、生卒年、仕履、著述等方面情况,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梳理考证,澄清了很多模糊认识,对前人的某些失误进行了详细辨正,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研究者提供了文献著者准确、翔实的生平资料。例如《集杜诗

词》二卷的著者徐鹏，周采泉《杜集书录》称其为“顺治时武进士”，本书根据《（同治）上江两县志》之《科贡》与《耆旧中》提供的资料，指出其应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武进士。这样的考证工作费时费力，不少人视为畏途，甚或以零散琐碎而忽之，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考证，为宏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价值是不容质疑的。

孙微博士曾从我攻读唐宋文学，其博士论文即为《清代杜诗学史》，修改后已由齐鲁书社于2004年出版。其后，他一直以清代杜诗学文献为学术主攻方向，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对繁琐的资料考证，人多不屑为之，他却乐此不疲，乐在其中。在当前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学术急功近利的时代氛围中，他的这种以学术为生命的坚韧精神尤为难能可贵。我主编的集大成式的《杜甫大辞典》，其中“版本著作”与“研究学者”两类之清代部分，就是由他个人负责编撰的，并任编委。最近几年，他在杜诗学文献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令我异常欣喜。他的又一部专著《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欣然应命，遂作序于上云。

公元2007年2月于美国旧金山

# 序

韩成武

清代是杜诗学史上第二次研究高潮期，著述繁富，成果显赫，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意义。从文献学角度整理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学界至今尚无一部这个时段的专门著述。

此前，学界同人在杜集书目的整理上已经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如马同伊等编撰的《杜诗版本目录》、郑庆笃等编撰的《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编撰的《杜集书录》，以及某些文化部门和个人编撰的杜集书目等，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这些著述是对杜诗学史全过程文献的整体性观照，或因限于时间和人力，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尚未做到尽善尽美，诸如在书目的搜集、作者的考订、文献的存佚调查、版本的研究等方面，尚存在若干失误或缺陷。

孙微博士近年来致力于清代杜诗学史研究，对清代杜诗学文献作出细致的梳理和考证，立志摸清家底，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认真的访求、搜检，整理出一部较为详尽的清代杜诗学文献总目。前人所著的杜诗学文献目录，收集清代书目不过200多种，孙微则收集410种以上。如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陆钺《杜诗注证谬》、郑光时《杜诗心解》、史纪事《摘杜诗衬》等多种著述，均未见录于前人。文献收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孙微的劳动成果较为完整地显示了清代杜诗研究的

整体面貌,为人们认识这个时段的研杜成果、学术精神、研究方法  
与角度,提供了新的材料线索。当然,现在还不可说对清代杜诗  
学文献囊括已尽,这是个艰巨的工作,需要假以更多的时日。二是  
对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者的生平作出补述或新的考证。前人所著的  
几种杜诗文献目录,于文献著者的生平方面多有失考,留下许多空  
白。孙微潜心钩稽,细致考索,对若干著者的生平作出补述。例  
如,对于《杜诗字评》的著者董文涣、《红萼轩杜诗汇二种》的著者孔  
传铎、《杜诗培风读本》的著者席树馨等等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学人  
生平,均通过钩稽史料,作出明确的补述。据笔者统计,补述著者  
生平空白者多达 120 多人。此外,对于前人所著的几种杜诗文献  
目录中已经作出的著者生平介绍,孙微亦未轻易放过,通过广览群  
书,对若干著者的生卒年、名号等作出新的考证,收获为丰。据我  
统计,这类纠失内容多达 70 余处。三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存佚  
情况作出了全面调查和清理。对于前人所著的杜诗文献目录中的  
“见存书目”,尽一切可能找到书籍,目睹其貌,据孙微自言,他已经  
把绝大多数现存书籍看过了;对于前人所著的杜诗文献目录中的  
“散佚书目”,亦能详加追踪、搜寻,从而能够发现一些并未散佚的  
书籍,如应时《李杜诗纬》一书,《杜集书目提要》将其归入“已佚或  
存佚不明”一类,而实际上该书并未散佚,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和  
清华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此外,孙微还对确已散佚的文献,通过  
辑佚而基本恢复其原貌,如申涵光《说杜》一书确实早已散佚,而其  
书内容却为清代诸家广为征引,孙微把仇兆鳌《杜诗详注》、张溍  
《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杨伦《杜诗镜铨》、刘濬《杜诗集评》等书  
所引申语进行摘录,加以互校,使《说杜》一书基本复原。孙微所下  
工力,可谓深矣细矣。四是对清代杜诗学版本源流情况作出细致  
的研究,纠正了前人在这个方面的若干失误。如对张笃行《杜律注  
例》一书初刻本时间的考订,较之《杜集书目提要》所述提前了一百  
年。其他如对沈寅、朱崑《杜诗直解》一书初刻时间的考订,对朱鹤  
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一书初刻时间的考订,等等,均能注重理据,  
精审推敲,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孙微博士将其上述研究成果理成书稿,该书以时间为序将清代杜诗学文献分为四卷进行排列,每卷按照存、佚两部加以分述,每种文献之下均有著者生平介绍、版本源流述说。资料翔实,文字严谨,行文流畅,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整体面貌更为清晰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述。文献学是治学的根基,相信这部著述会为杜诗学界的同人提供很大的便利,在推动杜诗学史的研究上、对杜诗的研究上,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岁月如流。1996年,孙微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作为我的开门弟子,他按照我的布置认真解读了杜诗的全部文本,对杜诗的多数作品能够背诵,进而对杜甫的思想精神和艺术风貌有了整体性的把握。其后,他考取了张忠纲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对杜诗文献学有了清晰的认识,其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杜诗学史》获得专家的赞评,也为这部书稿的成功撰写打下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余也老矣,心力不足,看到杜诗研究后继有人,则欣慰有加,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写出上面的话权以为序,并寄热诚希望于撰者。

2007年2月2日于河北大学紫园

## 前 言

清代是杜诗学史上继宋代以后的第二次研杜高潮,也是杜诗学发展的集大成时代。这个时期许多重要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其中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略有: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清代杜诗学文献呈现出广泛化、多样化的特点,除了继承宋以来传统的编年、分门、分体、分韵、李杜和刻等选注方式之外,又开拓出谱释、考据、类比、证选等多种全新的笺释方式,从理解、阐释、分析、量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极大地丰富了杜诗学文献的形式,使得杜诗学研究的百花园内姹紫嫣红、争奇斗艳。那么清代作为整个杜诗学史上最为兴盛的阶段,杜诗学文献的总体情况如何?其中哪些尚存,哪些已经散佚?目前学界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现状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归纳、整理及反思。目前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概括。

### 一、清代杜诗学文献目录的厘定整理

当今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了解,主要是援据以下几种书目,即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 1986 年版)、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马同俨、姜炳旻编《杜诗

版本目录》(《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此外还有一些文化部门或个人自行编辑的杜集书目,如《成都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南京图书馆馆藏李白杜甫诗文集及研究两家的著作善本临时书目》、贺昌群《收藏杜诗书目》、梁一成、梁容若《杜工部关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对杜集的搜罗考证甚详,其筚路蓝缕之功,于杜学居功至伟。不过以上这些书目中所收清代杜诗学文献数字不一,互有异同,检索起来颇有不便。而且它们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些失误,因而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甄别、考订和整理。据笔者统计,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中收录现存清代杜诗版本 142 种,散佚注本 92 种,集杜书目 23 种,共计 257 种。不过该书中存在误收现象,比如有将明人著作误为清人的情况,例如郑日强《杜诗注》、赖进德《李杜诗解》、陈懋仁《李杜志林》、杨光溥《杜诗集吟》等。另外,也有将清人著作误入明人名下者,如王西樵、黄大宗《杜诗分韵》、阮旻锡《杜诗三评》等。而且《杜集书目提要》中还有重复收录的现象,如该书《知见书目》部分有龚书宸评注《赏音阁杜诗问津》,《著录存目》部分又予收录,书名作《杜诗问津》,二者实为一书。又如该书《著录存目》中著录的《杜诗叢评》,实即《知见书目》中所著录的刘濬《杜诗集评》。如此,除去重收、误收的情况,《杜集书目提要》实际所收清代杜诗学文献为 240 余种。马同俨、姜炳圻编《杜诗版本目录》相对较为简略,且所著录的都是见存文献。此目将同一版本中的不同名家批校本都另立一条予以著录,另外该书目中还存在一些同书异名的情况,如果除去这些情况之外,该目录实际收录清代杜诗学文献 77 种,这个数字远不足以反映现存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情况。周采泉《杜集书录》一书巨细不遗,收录宏富,其中收录存佚清代杜诗学文献多达 330 余种。不过《杜集书录》中亦存在重收、误收现象,而且 330 这个数字当中还包括 80 余种名家批校本。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杜诗批注本并不能算作严格的著作,虽然这些杜诗批注本中却并不乏精彩绝伦的妙解和胜见,也构成了清代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若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统计的话,则《杜集书录》实际所收清代杜集

版本有 230 余种。当然,以上这些书目并不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已经囊括一空,在笔者长期的搜检过程中,就不断发现上述书目均未予收录的大量清代杜诗学文献,如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陆钺《杜诗注证谬》、郑光时《杜诗心解》、史纪事《摘杜诗衬》等。当代学者对此也续有发现,如蒋寅《清诗话考》中,就著录了酸尼瓜尔嘉·额尔登萼《一草堂说诗》、郑同甸《评杜诗》等。这些被遗漏、忽略的杜诗学文献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采。

总之,以上这些书目只是大体上反映了清代杜诗学文献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所收文献在数目上互有出入,亦存在许多失误,其中每一种书目都不能全面反映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学界还缺乏一个相对完整、令人完全满意的书目,故极有必要全面整理研究这些存佚的杜诗学文献,先整理出一个相对完备的书目,做到摸清家底,为进一步研究清代杜诗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献基础,然后才能进行考证文献产生时间和归属以及流传影响情况等方面的工作。

## 二、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考证

在上述权威的杜集书目中,一些清代杜诗学文献的著者生平情况并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有许多著者的生平我们目前还不甚了解。对这些著者缺乏了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由于资料匮乏,文献无征,其中很多著者的生平已经难以稽考,但还有许多情况是由于我们投入的研究力量不够造成的。比如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杜集书录》等书在文献著者生平考证方面,就存在很多不足,兹举几类如下:

### (一) 著者生平失考

《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中有许多杜诗注本的著者,编者都称生平事迹不详,其实这其中有许多著者的生平是可以考知的,甚至这些撰者中有好多还是当时的名人。如《杜集书目提要》中著

录《杜诗字评》的著者董文涣，称其“生平未考”。据考，董文涣（1833—1877），原名文焕，字尧章，号研秋，一号研樵，亦作岷樵，山西洪洞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充武英殿、国史馆协修等。同治四年（1865）补甘肃甘凉兵备道。途经陕西，为布正使林寿图奏留委办山西米捐局事。十一年，调甘肃巩秦阶道，主厘金局。著有《岷樵山房诗集》十二卷、《藐姑射山房诗集》二卷、《孟郊诗评点》二卷、《杜诗字评》十八卷、《声调四谱图说》十二卷、《集韵编雅》十卷，辑《秋怀八首和韵》二卷。又如《红萼轩杜诗汇二种》的著者孔传铎，《提要》称其“生平不详”。据考，孔传铎（？—1735）字牖民，号振路，山东曲阜人。雍正元年袭衍圣公。工诗，著有《申椒》、《盟鸥》二集。亦善词，著有《红萼词》二卷。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三、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一三、《晚晴簃诗汇》卷五〇、《全清词钞》卷九等。又如《杜诗培风读本》的著者、《杜解通元》的校录者席树馨，《提要》亦失考，《杜集书录》将著者误作“叶树馨”，称“始末待考”。据考，树馨，字枝山，又字鹤如，怀来（今属河北）人。道光十七年拔贡，中咸丰三年（1853）吴凤藻榜进士，历任四川长宁知县。在任修书院，设文学，请名师，教士子，人文俱兴，为诸邑之冠。著有《代笺录》、《古文文笔》、《金丹选注》。生平事迹见《怀来县志·科第》。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此不备举。

## （二）著者生卒年考证之失

《杜集书目提要》、《杜集书录》对清代一些杜诗学者的生卒年问题考证也存在许多问题，亟需加以订正修改，兹作辨正如下。《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作者顾宸，《提要》称其“生卒年不详”。据《锡山书目考》卷四，顾宸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十八，当可据。《乐句》及《杜诗律》的作者俞瑒，《提要》中亦不详。而据《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江俞瑒（犀月）生。另据《秀野草堂诗集》卷五载，俞瑒卒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十一。又如《杜诗论文》的著者吴见

思,《提要》称其生于明天启初年(1622)左右,未载其卒年。《杜集书录》阙载。许总称其生卒年为(1622—1685),不知何据。而据《昆陵名人疑年录》载,“天启元年(1621),武进吴见思(齐贤)生。”又同书卷一称:“康熙十九年(1680),吴见思死,年六十。”则吴见思之生卒年,似当以是为准。《杜诗阐》的著者卢元昌,《提要》称“其生平事迹不详”,而《东柯鼓离草》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华亭卢元昌(文子)生。”同书又称,康熙三十二年(1693)卢元昌尚在世,是年作《元日遣兴》诗,年七十八。则其卒年,当晚于是年。《杜诗义法》的著者乔亿,《提要》称其“约生活于清康熙、雍正时期”,《杜集书录》据《广陵诗事》称其生卒年为(1692—?)。而据乔亿《三晋游草自序》称,其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据《游道堂自序》卷四,乔亿卒年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十七,当以为据。再如《杜诗琐证》的著者史炳,《提要》称其“生卒年不详”,《杜集书录》阙载。据史炳《句俭堂集》卷二自称,其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卒年至少应在道光十年(1830)以后,因为据《句俭堂集》卷四载,是年史炳年六十九,曾作《重修泾城碑记》。《杜诗笺》的著者汤启祚,《提要》称其“生卒无考”,《杜集书录》据《重修宝应县志·文苑传》称其为“康雍间人”。而《疑年录汇编》卷九称汤启祚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十六,当可为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一。

### (三) 名号之误

《杜集书目提要》中还存在一些将著者的名号颠倒混淆的失误。如《杜园说诗》(书名应为《杜园说杜》)的著者署名为“江田”,实应为梁运昌,因其号江田,故致误。严虞惇,号“思庵”,误作“思巷”。范廷谋,字周路,号省庵,误作字“省庵”。张雍敬,字珩珮,号简庵。误作“字珩珮,一字简庵”。江浩然,号孟亭。误作“字孟亭”。庄咏,字麋唐,误作“字六峰”。《杜诗补注汇》的著者沈元沧,误为沈名沧。《杜诗心会》著者署为“毛西原”,应为毛文翰。文翰,字彦祥,号西垣,又号西原。《尊道堂集杜诗》的著者署名“王子

重”，应为王材任（1652—1739），字子重。周采泉《杜集书录》一书中人名、字号出现舛误的情况也比较多。如《杜诗评》的著者朱铨，误作“朱銓”；《杜诗评林》的著者方驾，号鹤仙，误作“字鹤仙”；《杜诗考注》的著者凌赓臣，字以成，误作“字以末”；《少陵诗选》的著者田国文，字荆阳，误作“字荆扬”；《集杜诗》的著者陈光龙，误作“陈龙光”；《杜诗疏义》的著者王家瓚，字端臣，误作字“瑞臣”；《杜诗正》的著者邵志谦，误作“姚志谦”；《读杜慎言》的著者赵泖，误作“赵佃”，蒋寅《清诗话考》又误作“赵田”；《杜律含英》的著者任梦乾，误作“顾梦乾”；《集杜诗钞》的著者齐图南，误署为其兄“齐召南”等等。一些著者名号失误乃至及将文献名称致误的情形所在多是，兹不备举。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目前对清代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情况的研究还远未臻于完备，不仅存在大量错误，甚至还存在着研究的真空和盲点，亟需学者们着力进行考证，细致准确地理清著者的基本情况。

### 三、清代杜诗学文献存佚情况的整理研究

清代虽然去今未远，但是由于天灾、战争、动乱等原因，大量清代杜诗学文献已经散佚。即使现存的许多文献也大都仅见于藏书家著录，它们或尘封于国内外各图书馆及一些文化单位，或收藏于私人藏书家手中，随着个人藏书的辗转迁移，直至不知所终。所以要全面系统梳理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体概况，首先要清查文献的存佚情况。目前抢救性地保护整理一些面临散佚危险的文献，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项首要任务。例如清初萧云从《杜律细》一书，至民初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尚著录有刘喜海道光抄本，然沅叔故后，藏园所收此抄本如今已经不知去向。方文的《杜诗举隅》一书，近人汪汝燮《江苏书征初稿》尚有著录，今也片羽难求。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另外，还有些清代杜诗学文献并未散佚，只是由于多系写本、抄本，流传绝少，或者虽曾

刊刻,却流布甚罕,致使经多方稽访难睹其面的学者们误以为其书已经散佚。如应时《李杜诗纬》一书,《杜集书目提要》便将其归入“已佚或存佚不明”一类。其实该书并未散佚,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那么对这一部分杜诗学文献,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搜采和访稽。另一方面,目前除了对存佚未明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进一步搜集整理之外,笔者认为,通过现存杜诗学文献的征引,对散佚文献进行辑佚,亦不失为杜诗文献蒐集的另一可行途径。也就是说,即使有的清代杜诗注本已经散佚,但是可以通过后代其他文献的转引进行辑佚,通过这种方法,有些文献甚至可以基本恢复原貌。比如清初申涵光《说杜》一卷,约在乾隆朝以后就已经散佚了,不过仇兆鳌《杜诗详注》、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杨伦《杜诗镜铨》、刘濬《杜诗集评》等书征引颇多,近年杜诗学界又发现《说杜》的韩菼过录本,虽非全帙,却与上述文献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若对仅为一卷的申涵光《说杜》进行辑佚,那么依据以上文献,采用细致的校勘方法,恢复该书的大略,当不是难事。再如清初李因笃的《杜律评语》一书,成都杜甫草堂曾将此书列入1959年第二次《征集书目》,书名作《杜诗评》,迄今未见,可能已经散佚。然李因笃之论杜语散见于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杨伦《杜诗镜铨》、刘濬辑《杜诗集评》、时中书局石印本《诸名家评定本钱牧斋笺注杜诗》、朱彝尊《曝书亭集》等书,若能对上述文献进行详细的甄别校辑,则亦可约略恢复李因笃《杜律评语》一书的概貌。

#### 四、清代杜诗学文献版本的整理研究

当今学界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版本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卓著,许多杜诗注本都陆续得到研究和关注。然而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研究只是局限于某个注本本身,而较少注意同时前后杜诗学文献之间的承继关系等等。即使对杜诗注本本身的研究也未臻完备,所得的一些结论还有待于商榷。如



清初张笃行《杜律注例》一书,《杜集书目提要》认为张笃行生前未曾刻印,所据为该书卷四末张笃行玄孙张道存跋文:

是编予童时即得见之,不解读也。久藏篋中,迄今二十余年,始知先高祖一生精力苦心具见于此。幸逢盛世,诗学昌明,四方相与力追风雅。则是编也,或不宜私之一家云。乾隆己卯季夏月中浣,元孙道存谨书。

“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提要》编写者据此认为该书实刻于是年。其实此书在笃行生前即已刻印,因系家刻本,流布未广,才让后人生此疑窦。《杜律注例》前有张笃行《题词》,署为“顺治己亥荷月”,即顺治十六年(1659)。孙殿起《贩书偶记》、《北京图书馆杜集书目》、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都著录有顺治己亥(1659)刻本。可见确有《杜律注例》顺治己亥(1659)的原刊本,而乾隆己卯(1759)为重刊本。《提要》据重刊本判断该书的刊刻年代,比初刻本整整晚了一百年。又如沈寅、朱崑补辑《杜诗直解》,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凤楼巾箱本。该本书名页误标作“乾隆乙未年新镌”,以后各家书目多沿其误。如《贩书偶记》著录:“乾隆乙未凤楼精刊巾箱本,与《李杜直解》合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误标“清沈寅、朱崑辑,清乾隆四十年凤楼刻本”。《杜集书录》则误标“清乾隆丁未(1787)来凤楼刻”。《杜集书目提要》则误作“朱凤楼藏板,乾隆乙未(1775)刊”。另如徐树丕《杜诗执鞭录》稿本,《杜集书目提要》的编写者将其归入明代,所据当系该书末明人姜垓跋,其实该稿本的写定年代,应入清以后。王颂蔚《古书经眼录》著录的《杜诗执鞭录》,在第十四卷收录钱谦益所撰《杜工部年谱》及朱鹤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诗,则该稿本的成书时间,应在钱、朱二注之后。而且姜垓为姜埰之弟,和徐树丕一样都是由明入清的人物。故该书的著录,应归入清代。再如清初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一书,本与钱谦益《钱注杜诗》共为清代杜诗